

主持人语:虽然经济全球化洪流势不可挡,但并非一片欢呼。特别是西方学术界不断有所谓“反世界文学”与“反全球化”的声音响起。其实我们早已经于2016年率先对美国学者的“反世界文学”理论进行了评析,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这可能是世界学术界最早对这种学说进行理论批判的。这是超乎欧美学术界与国内部分学者想象的。

全球化时代中国儒学正在进入“世界化”世界化的“大儒学”已经登程。我们最近在《上海文化》等刊物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阐释讨论,提出“马儒”的重要概念,正是针对西方的“上帝死了”的宗教危机,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国复兴中是如何应用儒学的。特别是要研究中国儒学作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的持续至今的人文信仰,它不同于宗教信仰之处在哪里?它对于全球化时代有什么价值?为什么21世纪全球化中各国普遍将中国儒学作为重要的信仰参照系?

这些问题正是本期专栏关注的中心,论文对于中国儒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都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特别是“世界儒学”关于儒学自我变革与儒学的时代价值,都有独创性的见解。我们将继续在本刊与多家学术刊物进行这一主题讨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要有文化自信。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儒与儒学世界化国际学术会议在苏州大学召开,我们将选取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在本栏目发表,让中国声音在国际学术界更加响亮。

大儒学重铸:全球化的人文信仰

方汉文

(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在西方“上帝死了”的宗教危机与民粹主义思潮的连绵起伏中,儒学则在全球化中步入世界性的大儒学阶段,其根本动力在于它独有的非宗教的人文信仰。人文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列世界四大信仰,并因其“世界大同”、仁义礼智信、道学心学等思想为21世纪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信仰。儒学的人文信仰经过严峻的历史考验从汉代开始在中国成为主导信仰延续二千年,经历过中古以来的亚洲传播、17到19世纪的欧美接受等不同阶段,现在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化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儒学(马儒)作为后工业化社会世界性信仰重建的主要资源,受到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民族的广泛接纳,也是当代大儒学的主流之一。大儒学对全球化有信仰宇宙观、文明体系、社会经济和人生价值确立四大领域的人文精神参照性,必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关键词]儒学全球化;马儒;儒学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3-0005-07

一、人文儒学的世界定位

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新书《文化与上帝之死》中说,自己写书的宗旨是研究当代西方由于“上帝明显缺位”而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始于启蒙运动而终于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的勃发和所谓的反恐战争”。^[1]

我们当然并不赞同作者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说法,但是明确无误的是,从尼采开始的“上帝死了”的惊呼、恐怖主义肆虐、民粹主义复萌,都与全球化时代西方的宗教信仰危机相关。

相反,中国儒学处于世界化进程之中,从汉唐

[收稿日期]2017-02-08

[作者简介]方汉文(1950—),男,陕西西安人,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亚洲传播、18到19世纪欧美的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儒学热潮、亚洲四小龙的“儒学复兴”之后，步入第四次世界性大传播。秘鲁学者佩雷斯的新作《儒学与全球化》可以看作是其信号之一。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国第一王朝夏王朝开始于公元前 2070 年，历时 4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进入殷商，武王克商为公元前 1046 年。^①周公姬旦辅佐武王与成王，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孔丘（公元前 551 年—前 479 年）诞生于公元前 551 年，从周公到孔子，大约是五百年。这就是以后中国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说：“先人有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对于中国历史有什么贡献，会受到如此的尊崇？

简而言之，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奠定了春秋时代中华文明的伟大转向，这一伟大转向就是从宗教信仰转向人文信仰，孔子是世界古代文明中至今尚存的、唯一的非宗教的人文主义文明的缔造者。东西方文明其实是同时进入文明创新时代的，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即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认为，大约从公元前 455 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休战和约之日起，“以后四十年为雅典帝国时代”。也就是说，前 5 世纪的中国春秋时代与几乎同时期的雅典城邦同时进入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春秋诸子，雅典的塞诺芬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群，分别在东西方开始了人文精神的建构，这是走出崇拜时代之后，世界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突进。德国卡尔·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大意是对的，但是并不准确，他所说的“宗教萌芽”与其他古代宗教文明等是不符合人类文明史实况的。这里无须多言了，笔者在《比较文明史》等书中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分析。

但历史却如黑格尔所说，先是悲剧后是喜剧出现，东西方人文主义信仰的结局出人意料地完全不同。中国汉代开始独尊儒术，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非宗教人文文明的主体。而希腊被罗马征服，最终以基督教为国教，确立一神教的西方文明模式。这可以看作是世界主要文明发展史上，人文信仰上的第一次成功与第一次失败。而同时代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古代印度都一直是多神教，直到公元 7 世纪伊斯兰宗教兴起，世界文明成为四大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与儒学。前三者都

是宗教，只有儒学是非宗教的人文信仰。

孔子一生中主要的活动是授徒讲学，是中国最早的私人授徒者之一，据说他有 72 个得意学生，即 72 圣贤，一生学生多达 3000 人，在当时显然是相当多了，所以认为孔子是教育家。中国的圣人是一个教师，不同于可能作过牧羊人的耶稣，王子出身的释迦牟尼，更不同于商人出身的穆罕默德。这对于中国信仰的形成也是意味深长的。为人师表是君子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孔子撰写了鲁国的历史《春秋》，这是孔子最得意的著作。中国文化中重视历史，不知是否能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孔子死后，门徒整理了他的言论集《论语》，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另外一个重要活动是周游列国，大约在公元前 552 年，他曾经带领学生到各国去游说，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却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于是孔子回到鲁国，以授徒与著述为业，终其一生。

孔子学说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对人文精神的颂扬，孔子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学说，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儒家”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基本素质是“君子”或是“士”，即一个有人文主义理想、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即如《论语》中所言：“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是一种人格形象，也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形象在世界文化中也是独特的。它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也不同于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等，当然更与基督教的圣徒使徒们无缘。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用清教徒的教士来比中国的儒生，确实是不伦不类，证明他对东西方社会的差异理解不足。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他所描绘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有远大理想与抱负，追求真理而不唯利是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有仁、智等思想品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矣”（《论语·宪问》）。君子为人襟怀坦白，“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从殷周的“天帝”到孔子本人的“圣人”（而不是神灵）及其所提倡的君子无疑是信仰的一大变动，是从神转向人。后世对于儒者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崇拜，与世界宗教信仰是有冲突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重要的人文形象树立，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与

^①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版中的有关论述。

主体性研究的萌发。

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人本主义高潮涌起,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书中,曾经将希腊哲学的智者学派的兴起作为标志,认为西文文化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的观念和意志力。这是荷马以后希腊人精神与信仰方向的一个最重要转变:从神向人的一个转向,人本主义思潮在西方掀起高潮,人的赞歌响彻爱琴海岸,正如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所说:

这个世界上令人惊异的事情太多了,却没有
有什么能比人本身更令我们惊诧,人们借且于
南方的大风横穿灰濛濛的海洋,穿行在风浪之
中。人类甚至敢于打扰那古老的大地女神,他
们骡子这些马的变种去耕耘大地,又用铁犁来
翻开土地。人类用密网来捕捉那无忧无虑的
鸟儿们、最凶恶的猛兽和大海里自由自在的鱼
儿...^[2]

可惜的是,希腊人的人类颂歌过于短暂,转瞬即沉寂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祈祷声中。进入中世纪之后,西方文明发生了重要转折,从人文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转向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所以宗教家对儒学有一定的反感,因为孔子儒学是对人的崇拜而不是对神的崇拜,必然引起宗教民族的反对。孔子思想传入欧洲后一直因此受到非议,即使在启蒙主义发达的18世纪法国多数人仍然认为,儒学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冲突,首先是一种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冲突,这是最不可调和之处。

关于“儒”这个词的起源:胡适曾经在《说儒》中表达过如下一些看法:

其一,即儒的古义之一是指生活于周代的殷商遗民,这是因为从“儒服”可以看出“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特别是三年丧制等,可以作为佐证。其二,易是殷人的卜巫经典,儒是殷人宗教的传教士。其三,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立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深衍有自”。^[3]

关于“儒”的来源,在胡适之前有章太炎《原儒》,在胡适之后有郭沫若《驳‘说儒’》。三家之说俱有博依,更确切地说是各有所据,其实也是各有贡献亦各有不足。章氏喜说儒而且不乏新见,他从经学入诸子,经史结合,对于儒学的历史功过可谓如数家珍。可惜章氏通古过于知今,与胡适之、郭

沫若所据新学不同,胡、郭对于世界文明史、人类学、西方哲学皆有一定素养,这是章氏所不及之处,而且章氏每有过激之论,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他曾在《与柳翼谋论学书》中说过自己“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章氏的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儒有三科”之说,关于儒字的来源,章氏提出“儒之名盖出于需”,并且引用《说文》、《春官》等来证,这对于儒的考证是有开拓之功的。而郭沫若主要反驳了胡适的观点,郭沫若甲骨文金文的功夫也是胡适所不及的,所以引用殷虚卜辞和金文,证实了胡适所说的“三年丧制”其实是一种臆测。更重要的是,郭氏利用古代资料证明,儒的出现不是殷之遗民的化身,而是由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社会阶层。郭沫若说:

儒的职业化或行业化,同时也就是知识的普及化。从前仅为少数贵族所占有的知识,现在却浸润到一般的民间来了。这与其说是某一位伟大的天才之所为,无宁说是历史的趋势使之不得不然的结果,时势不用说也期待天才,天才而一遇到时势,那自然会两相焕发的。孔子是不世出的天才,我们可以承认,但他的功绩却仅在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知识普及到了民间来了的这一点。…就拿思想来说吧,儒家的关于天的思想,不外是《诗》、《书》中的传统思想,而最有特色的修齐治平的那一套学说,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从旧文献上去找证据要多费一遍考证工夫,难得纠缠,我现在从周代的金文里面引些证据出来。厉王时代的《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便都是很好的证据。…故尔这些铭辞,同时也就是胡适的那种观念说的最倔强的反证,而且胡适所说的由孔子所“建立”的“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已经被包含在这里面了。这些铭辞正表现着一种积极进取的仁道,其操持是“夙夜敷求”,其目的是“柔远能迩”,并不那么退让。而使我们感觉着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读到这些铭辞是可以得到新的领会的。^[4]

郭沫若的论证不只是反驳了胡适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验证了我们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申明,儒学的出现是一种精神信仰转变的产物,这种精神信仰的变革就是从殷商的神巫崇拜转向周代的人文信仰。儒学以孔子为创始人,但其思想来自于易经等经典,是周的新文化的产物。这种思想就所谓的仁义礼智封建道德,经过孔子等

人的提倡,这种精神最终胜了旧的宗教,在春秋战国之后,儒学经历了一场厄运,秦并不信儒家学说,直到汉代之后,儒学才战胜了中国本土的黄老学说与道教、外来的佛教等多种宗教,完全取得了中国精神信仰的主体地位。

当然,无须说明,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不同于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学在发展中与释、道合流。虽然这并不是儒学自身的需求,更多地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形势使之如此。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的确对于这一形势的产生是有决定作用的,《论语·为政》中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也可以看出孔子是能够兼收并蓄的。

二、儒学的非宗教性

儒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信仰,它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必须首先明确的。中国与世界历来都有人认为儒学是宗教,从启蒙主义者莱布尼茨直到马克斯·韦伯,都习惯将儒学称为“儒教”,相当部分中国学者也认为儒学是一种宗教。但是所有主张儒学是宗教的人都无法清楚阐释一个关键:孔子本人对于宗教的看法,如果说儒学是宗教是“孔教”或是“儒教”,但却无法否认孔子本人坚决地否认宗教的历史事实,这种“儒教”之说确实无法成立。

西方学者历来攻击中国文明之处在于:中国人不信宗教。其实并不知道,中国是古代宗教最早的创造者之一。

从殷商以来的天帝仍是春秋时代的重要宗教信仰,敬鬼神,信巫覡,崇拜天帝仍然是社会习俗。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能说是无神论,却明显表现出一种非崇拜的态度:“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论语·雍也》)

而且孔子对于所谓的“天”也不是太恭敬,时时有些抱怨之词,他曾经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已经接近于自然神,几乎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的。天帝的概念已经转变为“天道自然”,已经不是殷商人所崇敬的天帝了。孔子也有“天生予”、“天厌之”之类的说法,但也并不是敬神敬天的态度。相反,可能倒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观念,即《左传·昭公18年》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可以说相当程度地淡化了崇拜情绪。具体来说,孔子所推崇的“礼”与“仁”,既不完全是神也不完全是祖宗,而是一种独立的思想观念。这是孔子世界观最重要的特点,

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认识孔子思想和其历史地位的入门。最有意思的是,孔子虽然并不热衷于天帝,但是却对于天命十分崇拜。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孔子可能经常与学生谈论命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甚至把知命作为君子的标准,他曾经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不忧”之类的话。

如果作一个共时性的比较,他的“命运”观,与古希腊人竟十分相象。希腊悲剧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人与命运的冲突,这种命运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荷马时代的天神观念的一种进化,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产物,表明了希腊人宗教观的新发展。希腊文中“命运”一词写作 *μοιρα*,它的原意就是时机,其深层意义是指神所赐给人的生存机会,以后被泛指一切时机与机缘。这个词的典故出自希腊神话,据说有三位命运女神,即拉基西斯、克洛索和阿特罗波斯。她们三个人合作,在纺织机上织出人类生命。人生命之线就是“*μοιρα*”命运。“生命的纺锤”是西方的一个隐喻,就是从神话里来的。德国诗人海涅有一首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描写纺织工人,其中说道:“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三重的诅咒。”就是对于封建德国命运的诅咒,这个隐喻可以说来自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希腊人俄底修斯返回故乡时遭到种种苦难,是受到三种诅咒,即三种力量作用的结果,除了与他敌对的海神波塞冬之外,第二个重要力量就是“命运”的捉弄,第三个当然是世上的敌人包括求婚者了。以后的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创作中,命运概念就与荷马有一定的不同,前苏联学者塞尔格叶夫曾经这样评论:

照埃斯库罗斯的看法,命运接近于神性,照索福克勒斯的看法,命运是存于人类之外的抽象概念,然而,照这第三位雅典伟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命运就在人自己的身上。欧里庇得斯把命运与人底睥睨一切的激情看成一个东西。欧里庇得斯是现实的心理的戏剧之创造者。^[5]

归根结底,希腊人的命运经历了从神到人的一个回归过程,这个舞台上的精神回归过程其实正是现实中生活转变的映象。伯利克里斯时代的繁荣一去不复返,内战时期掌握政权的是激进民主派,民主政治成为愚弄人民的手段,社会变革不断引发社会动荡。怀疑主义哲学得到有利时机,他们对神权与道德的解释十分风行,对于瓦解传统观念是一剂有力的催化剂。他们用理性来解释宗教,如认为

大神宙斯来自于“空气”，是人格化的神。这是西方传统中的宗教理性化的一个前兆，一个不为人所认识的前兆。

同样，孔子当然是用“天命”来化解绝对宗教崇拜特别是“一神教”，这种天命观不是宗教观念，而恰是人文主义的一种话语。

这里顺便说到“批孔”的一个话语，即孔子的“一意循旧说”，不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而且曾经在日本等国流行。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批孔”运动，其理论根据是孔子“复辟倒退论”，即以“克己复礼”为复辟倒退的说法，以上说法堪称无独有偶。我们结合孔子“天命”说来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天命”或“命”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所以历来有人主张孔子学说是宿命论，这显然是“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孔子所主张的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就把天命作为君子行为的一个准则，一般认为这是孔子思想的局限性。

因为在人文主义信仰这个决定因素上，春秋时期其他伟大思想家包括墨子等人都无法与孔子相并列，墨子的“勇力强武，坚甲利后，鬼神之罚必胜之”（《明鬼下》），这种理论将上天降格为“鬼”，其实已经倒退到周公之前了，成了多神论的牺牲品。因此把孔子说成是“倒退复辟”的学说，确实是不合乎实际的。因为孔子所说的“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显然是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这是对于殷周革命的一种肯定，是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倒退，如果倒退，孔子大可不必“从周”而可以“从商”。从文明程度而言，西周显然是比不上殷商的，所以孔子的“从周”及对周公的赞赏其实是对人文精神的肯定。

三、哲学非决定论

一切宗教都是决定论，如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人类有原罪，世界末日必然来临。

但人文主义思想都是辩证法的非决定论，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互生关系。孔子儒学的主要认识论与实践方式是“中庸之道”。孔子本人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但这个“一”是什么？孔子没解释，曾子认为是“忠恕”，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笔者认为，“忠恕”、“礼”与“仁”等都是孔子的一种重要观念，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它们毕竟不是孔子的“道”，只是孔子的伦理学原则之一。孔子的道是“中庸之道”，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孔子仍然是有哲学的，有自己的认识论的，只不过这种认识论与西方的认识论有所不同，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是伦理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西方的认识论是形而上学的。中庸是孔子认识

与行为的中心，是一种原则，所有的认识与行为都是出自这一原则。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中庸”根本称不上是一种认识论，只是一种伦理学，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中，就是以中庸问题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正如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完全的相反一样，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与孔子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反对中庸。

什么是中庸之道？

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中，无论天与人、人与人、人的自身，都是处于差异与同一的互相作用过程，这一过程被中国人用阴与阳来代表，这就是易经的阴爻与阳爻符号以及这一对符号所构成的卦象。从易经的原理来看，这就是易经的变化生生不息，是一种循环往复与差异同一的思想。差异是指不同卦象，同一是指永远不变的阳阴爻。卦象中所透出的是古老的生存与死亡的法则，是事物辩证发展的规律，这就是中庸的来源。所以说中庸之道本质上是一种辩证认识论，如果从这一点而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儒学中庸之道是相通的，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毛泽东是最早肯定“中庸之道”的，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也是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指导下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关于理性精神自身的模式和工具的研究，这就是逻辑学的建构。中庸之道就是一种中国的辩证理性与文化逻辑。它是孔子从六经中提炼出来的，特别是《易经》的“阴阳互生”，“同异交得”观念，就是阴阳观念的拓展。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专心著述，整理六经，为儒学体系构建了人文主义辩证逻辑的经典。中国的逻辑可以说不是一种真正的形式逻辑，这并不是说它是无用的，相反，它与形式逻辑同样是反映人类思维规律的。它是一种早期的辩证逻辑，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方式。这种认识对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一种是东方的逻辑，以辩证关系为主体的逻辑。另一种是西方的逻辑，以认识方式为主体的逻辑。而且这不仅是两种逻辑体系的不同，也是与其相关的两大文明体系的不同。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文明的工具性表现。工具有实践性的，但是它是一种工具科学，科学以理论为特性。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特性判断上，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实践理性”，这个说法的错误在于用了康德的概念来说中国理性，笔者已经多次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理性指导的文明。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有所不同，这

种思维方式并不是所谓“实践理性”，而是一种辩证性理性。

中庸就是统一，是差异与同一的结合，就是一种辩证观念。这就是程颐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易者不易也，易经所表述的道理恰恰是不易。所以，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易经思想的延续，是一种辩证法。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这种中庸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所谓“允执其中”，反对极端，从一种调和的立场出发来解决问题，他解释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原则，不偏不倚的行事，即所谓“无可无不可”。这种认识方式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影响可谓巨大，而且是利弊互参。

这种“中庸”最容易产生一种诡辩论与折衷主义，对抗科学思维。一方面它的辩证性使得中国文化不具有唯一中心与自我中心论的特性，这表现为思想上儒释道合流，历来可以融化各种思想。董仲舒用传统的五行观念来解释儒学、宋明理学家把佛学等引进儒学，最后使得儒学成为一种集中多种成分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

中庸之道是古代辩证法。这种辩证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从感性印象出发，以抽象概念来归纳解决感性认识。中庸的认识主要表现于一种在观念上的调和，这就是礼与仁、德与法、名与理的调和，这种调和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主要是在其产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是合理而且曾经有过一定进步的。这种调和与中庸恰恰造成了它的历史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妨碍了它的重建与进化。但是，中庸观念并非一无可取，它有可能在新世纪文明建树中，作为一种泛逻辑化的观念，对于世界文明关系起到作用。

四、儒学能否全球化

从汉代中国丝绸之路开通，中国儒学就开始了以一种人文主义去重建世界信仰的历程，这并非儒学自身的义务与要求，更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的传播是在殖民主义进程中的宗教传教，所谓“一手持剑，一手拿圣经”，从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的中东战争，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把宗教传播作为主要手段。而儒学的传播则是一种文明交往的自然接受。是不同文明的民族选择了儒学，儒学也在传播中成为世界的大儒学。

儒学作为人文信仰对当代世界有什么价值？

第一是儒学的宇宙观，这是儒学区别于所有宗教的“本体论”。所有的宗教都要推崇天国的神灵

崇拜，而以俗世的人类罪恶作为对照，所以必然有基督教的“原罪”、为此要有“世界末日”的“审判”，也必须对人类进行“救赎”。相类似的如佛教“四大皆空”“来生超度”甚至“十八层地狱”与但丁《神曲》中的地狱都相似。而儒学没有“原罪”，也没有“末日”，当然也没有“天堂”与“地狱”或是“来世”之类。孔子只是主张“天道”，提倡为君子儒而不为小人儒；主张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修养。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太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学是一种现世的、此岸的，彻底的人文主义信仰。这与任何宗教都是不同的。孔子从不侈谈“鬼神”“生死”之类宗教话语，孔子甚至对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可以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追求道义的精神。孔子更没有“世界毁灭”的未来观，相反，儒学主张未来社会是“世界大同”，这就是所谓“郅治”思想，更何况还有相当切实的“天人合一”生态观念，比任何宗教都更要适应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存在机制。

第二，笔者将儒学的世界观与人生价值、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论述归结为一联：仁义礼智信，天地君师亲。这是十大关系。

只能简单解释一下，仁是博爱，义是道义，礼是社会秩序，智是人类思维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是诚信与信用的道德。天地近于希腊哲学中的“存在”的意义。其中难以解释的是“君”，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是自然与道德的伦理观念，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是这里的“君”在全球化时代则有对于秩序、道德与制度的尊崇，这是任何社会都必要的，全球化也不例外。当代社会各个阶层、家庭、个人生存都必须有准则，有准则才有自由。

这十大关系不一定为所有民族所接受，却会为全球化时代大多数人所遵从。原因在于它们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第三，全球化起之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所以全球化中世界经济一直居于中心地位。而后工业社会中，经济与金融危机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烦恼之一。与之相关联，世界秩序与文明冲突等困局因为经济与金融危机而加剧或是深化。在这种语境下，儒学的“义利之辩”往往被人误读，以为孔子不懂经济。其实子路货殖，孔子说“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相当支持经济贸易。所以儒学不仅不会被认为是不谙经济的腐朽理论，相反可能对经济全球化有启发。因为要对抗经济危机只有“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只有建立世界经济协同，就是儒学的“万邦谐和”。经济制裁、贸易保护以及民粹主义

的自我中心,都不如儒学的“和为贵”重要。这是更为根本的经济学,对国际上争论不休的西方经济学,比如凯恩斯主义之类学说可以大有参考作用。

中国复兴起源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儒学理论中,“小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其实昔日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已经有中国传统儒学的观念在其中,时至今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更是指导着“一带一路”的全球化进程。

第四,是一个相对关注较少,其实十分重要的人生观层面。孔子提倡一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学习不是指上学读书,而是人生探索自然与社会的态度。孔子论诗说“多识于草木之名”,就是多研究自然。所以人是需要教育的。科学技术是工具性的,而学习与接受教育教化,是人的终身目标。《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论述极为中肯: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从国家与社会来看,富裕并不最终目标,相当富足的国家与民族可能会因为富而不仁而陷入困境,因此民族教化才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的国家忘记历史,甚至在教科书中否认历史事实,对于民族性格与未来一代的教化已经有极大的危险。

个人与社会的心理、道德伦理是世界进步的推动力,儒学主张君子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修齐治平,其心性之学从宋明以后就受到世界广

泛关注。当然在未来社会中,只有通过学习来得道,才是世界的光明前途。

在谈到未来发展时,佩雷斯说道:

据此,我们坚持认为,参与中国增长的唯一办法,是建设性借鉴中国增长的同时,从其历史、文化着手去深刻理解中国。领会天下行动的深刻含义和动机,同时使我们的性格去适应共同的观点看法。^[6]

当然不必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信仰儒学,但是非宗教的儒学已经成为世界主要信仰或是思想参照系之一,这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人类思想信仰的变化之一,是不争的事实。

[参 考 文 献]

-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M].宋政超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
- [2] Sophocles. Antigone[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 Vols. translated by F Storr.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341.
- [3] 胡适.说儒[M]//胡适论学近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69.
-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41—443.
- [5]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325.

(责任编辑:程晓芝)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Flow Direction of Jianghua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of ‘Borrowing Water of Huanghe River to Rescue the Grand Canal’ During Qing Dynasty

PENG An-yu

(The Ministry of School Magazin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The section from Yangtze River to Huaihe River of the grand canal was originally excava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it was called Hangou. Befor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section from Yangtze River to Huaihe River of the grand canal is from south to north. However, through hundreds of years of evolution, it changed to the opposite flow direc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policy of ‘Borrowing water of Huanghe river to rescue the grand canal’; in the meantime, it reflects the major changes of the grand canal’s topography.

Key words: Grand Canal; Jianghuai Canal; Flow Direction